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下册 东欧史

罗伯特·拜德勒克斯 伊恩·杰弗里斯 著
韩炯 吴浩 柴晨清等译 庞卓恒 校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ries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下册

东欧史

罗伯特·拜德勒克斯 伊恩·杰弗里斯 著
韩炯 吴浩 柴晨清等译 庞卓恒 校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欧史：全2册 / (英) 罗伯特·拜德勒克斯，(英) 伊恩·杰弗里斯著；韩炯，吴浩，柴晨清等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2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1235-3

I. ①东… II. ①罗… ②伊… ③韩… ④吴… ⑤柴… III. ①东欧—历史 IV. ①K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1485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0-390 号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2nd Edition/by 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ries

ISBN: 9780415366267

Copyright © 2007 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rie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责 编：张爱民

责任印制：曹毅波

装帧设计：罗 洪

东欧史(上下册)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1000 毫米 1/16

字 数：946 千字

印 张：68.75

版 次：201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235-3

定 价：1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目
录
Contents

新版前言 / 1

编年表 / 1

巴尔干历史编年表 / 1

东中欧历史编年表 / 1

缩略语 / 1

导言：巴尔干半岛和东中欧的危机与变迁 / 1

第一编 从希腊罗马时期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的巴尔干半岛 / 37

第一章 巴尔干半岛的逐渐“巴尔干化” / 39

第二章 希腊罗马时期的巴尔干半岛 / 57

第三章 拜占庭的统治和它的影响, 395 - 1204 / 64

第四章 十字军、南部斯拉夫国家的出现和
拜占庭的衰落, 1095 - 1453 / 93

第五章 奥斯曼(西土耳其人)国家的崛起,
1326 - 1453 / 106

第六章 奥斯曼全盛时期的巴尔干, 1453 - 1686 / 117

第七章 奥斯曼衰落时期的巴尔干, 1687 - 1921 / 142

第八章 巴尔干民族国家的出现, 1817 - 1913 / 173

第九章 战争对巴尔干地区的灾难性影响 / 192

第二编 从罗马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期的东中欧 / 205

第十章 广为争议的 10 世纪以前东中欧的“族源”
问题 / 207

- 第十一章 10 至 16 世纪东中欧与西方基督教国家
明显趋近/ 218
- 第十二章 “分道扬镳”：15 世纪末至 18 世纪末东
中欧和西欧发展路径的根本分离/ 251
- 第十三章 奥地利哈布斯堡在东中欧霸权的
兴起,1526—1789/ 259
- 第十四章 波兰立陶宛联邦,1466—1795/ 276
- 第十五章 革命与“反动”：1789—1848 年的
哈布斯堡帝国/ 317
- 第十六章 “1848 年革命”：危机中的哈布斯堡
帝国/ 338
- 第十七章 帝国回潮：哈布斯堡君主制下的
反革命、新绝对主义和改革，
1849—1918/ 369
- 第十八章 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社会革命的
种子和奥匈帝国的分裂,1867—1918/ 421
- 第十九章 劫后余生：被瓜分后的波兰,1795—
1914/ 446
- 第二十章 奥匈帝国通往战争之路,1908—1914/ 483
- 第二十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东中欧的影响/ 492
- 第三编 从民族自决到法西斯主义和犹太人
大屠杀：1918—1945 年间的巴尔干
和东中欧/ 511
- 第二十二章 后 1918 年的巴尔干和东中欧政治
秩序/ 513
- 第二十三章 从革命和反革命到脆弱的稳定和
复兴,1918—1929/ 534
- 第二十四章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其
后果/ 552
- 第二十五章 农民阶级的困境：对农民贫困和
诉求的再评估/ 563

- 第二十六章 民主的失败/ 584
- 第二十七章 法西斯主义的诱惑：对法西斯主义的重新解释/ 596
- 第二十八章 共产国际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及其在赋予共产党 1945—1948 年夺取政权合法性中长期被忽视的作用/ 645
-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种族大屠杀, 1939—1945/ 674
- 第四编 在雅尔塔的阴影下：共产党统治下的巴尔干和东中欧, 1945—1989/ 739
- 第三十章 东西欧的分裂, 1945—1989/ 741
- 第三十一章 共产党政权在巴尔干和东中欧地区的崛起, 1945—1960/ 749
- 第三十二章 “民族共产主义”/ 789
- 第三十三章 从 1968 年危机到“1989 年革命”/ 813
- 第五编 后共产主义的转型/ 865
- 第三十四章 后共产主义的政治转型：“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问题的暴露/ 867
- 第三十五章 后共产主义的经济转型：从管制性资本主义到较为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 894
- 第三十六章 “回归欧洲”：东中欧和巴尔干后共产主义国家逐步融入欧盟和北约的进程/ 922
- 第三十七章 跋语：对于东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现代性方案结局的一些反思/ 988
- 索引/ 992
- 译者后记/ 1023

表格目录

表 9.1	巴尔干战争中估计的伤亡情况,1912 - 1913	193
表 18.1	奥地利和匈牙利经济年平均增长率	423
表 32.1	1952 - 1980 年南斯拉夫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的 官方数字	806
表 33.1	1981 - 1990 年南斯拉夫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的 官方数字	838
表 33.2	1979 年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硬通货负债	839
表 35.1	1990 - 2006 年东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分经济 指数	902
表 35.2	1990 - 2006 年后共产主义巴尔干国家部分经济 指数	904
表 35.3	后共产主义的东中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国家的部分 经济指数	907
表 35.4	2002 年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中高端技术制造业就业 劳动力百分比	918
表 35.5	每 100 位居民拥有汽车、个人电脑和连接互联网的 电脑数量,1999 - 2000 年	918

表 35.6	欧洲各国工业和服务业每小时劳动成本,2000 年.....	919
表 36.1	欧盟的公众支持率,1992 - 1996	935
表 36.2	东中欧和巴尔干加入欧盟的公投结果,2003 年.....	965
表 36.3	农业在就业人口总数和 GDP 总量中所占百分比, 2001 年	967
表 36.4	欧盟扩张对于欧盟农业资源的影响	968
表 36.5	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2004 年 6 月 12 日	970

第三编

从民族自决到法西斯
主义和犹太人大屠杀：
1918 — 1945 年间的
巴尔干和东中欧

第二十二章 后 1918 年的巴尔干和东中欧政治秩序

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尔干和东中欧的民主普遍衰败？这是 20 世纪历史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这次失败实际上瓦解了 1919 至 1920 年的和平基础，加速了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扩张，从而把欧洲卷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之中，这场战争也为 1945 至 1949 年间共产主义力量在欧洲和亚洲巨大的领土扩张铺平了道路，是冷战升级的加速器，造成欧洲被东西方瓜分 40 年。

第三编在很大程度上详细地回答了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在东中欧和巴尔干衰败这一关键问题。有些作者认为，整个方案把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建立在民族自决和民族国家边界与“种族划分”一致的基础上，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他们坚持认为这项计划本质上是有缺陷的，或者是由于东中欧和巴尔干复杂交错的种族关系而不切实际，或者认为那简直就是一个导致灾难的方案。在英语文献中，这一立场的最彻底的两位主张者是杰出的英国社会主义者 G. D. H. 科尔 (Cole 1941) 和发展经济学家多琳·沃里纳。(Doreen Warriner, 1950) 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方案主要方面是好的，但是却由于战时的承诺、大国的野心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以及经济和战略的考虑而被折中了，因此没有能够以足够公正、始终一贯和坚决彻底的方式贯彻实

施。休·赛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按此思路写过一部开创性的英语典籍。(Seton-Watson 1945)然而,第三个学派认为这个方案基本上是合理的,如果环境许可,就能够公正地、始终一贯地贯彻实施下去,并认为如果有 20 至 30 年的欧洲和平繁荣时期,新的秩序就会逐渐地扎下更深、更壮实的根,获得更广泛的接受,而许多的争论和意见冲突将会最终被折中解决,或是由全民公决,或是万不得已使用强制力解决。从这一观点看,主要是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和(并非无关的)法西斯的扩张这样的外因最终使这方案告吹了。在英语文献中,约瑟夫·罗斯柴尔德(Joseph Rothschild, 1974)对这一基本论点做了强有力的论证。

实际上,据说这三种观点和一系列的论证都有许多人支持。新的政治秩序确实已经出现严重裂痕,甚至可能是致命的缺陷。然而,如果没有战时的承诺,自私的地缘政治野心,胜利的西方强国的极度偏袒行为折中干扰,该方案本来可以产生比现实状况更多正面的积极成果。西方强国竭力强调“胜利者的正当权益”(偏袒他们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尽力在环境许可条件下尽可能始终一贯地、公正地去贯彻他们高调宣示的原则(特别是民族自决原则)。而且,1918 年后的协议安排和新政治秩序随后又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20 世纪 20 年代已经开始发动)和 20 世纪 30 年代全球大萧条造成的巨大衰减的影响而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虚妄而不确定的民族自决教条怎样酿成种族集体主义的祸害

321

在 1918 年以前,大部分东中欧和巴尔干地区曾经被超国家的帝国统治过数个世纪。1919 至 1920 年的和平协议标志着第一次试图以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为基础对东中欧进行重新组合,并按此方针在巴尔干针对 1914 年前的状况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919 年 6 月 28 日由战败的德国签字的《凡尔赛条约》解决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界问题,但是希望与德国统一的大量德裔少数民族却被留归波兰和捷克

统治。被肢解的奥地利在 9 月 10 日签署了《圣日耳曼条约》，规定了德奥与波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新的边界，同时也阻止了左翼和右翼与魏玛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联合的想法的实现。战败国保加利亚在 9 月 27 日签订了《纳伊条约》，肯定了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新的边界，否认了保加利亚对马其顿、西色雷斯和南多布鲁甲的领土要求。1920 年 6 月 4 日战败的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解决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与信誉扫地的匈牙利之间有激烈争议的国家边界问题，然而失去了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伏伊伏丁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几乎把 300 万匈牙利人丢弃到缩小的新匈牙利之外，而且使它与大部分天然的经济腹地隔开了。最后，在 8 月 10 日，被肢解后的奥斯曼帝国政府签订了《塞弗尔条约》，使希腊获得了东色雷斯，爱琴海的一些岛屿以及安那托利亚西部的一些地区，其中包括重要的港口士麦拿（现伊兹密尔）。然而，土耳其从未承认过这项条约，同时，希腊国家很快就遭遇反弹。1921 至 1922 年土耳其国民党人一次成功的反击重新建立了它对西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一些岛屿的拥有权。1923 年 7 月 23 日签订的洛桑条约确认了这一点，同时也批准了 1918 年后欧洲唯一的一次人口交换，大约有 110 万希腊难民（大部分来自士麦拿〔现伊兹密尔〕）被重新安置在希腊，38 万穆斯林从希腊被赶到土耳其。（Clogg 1992：101）其他方面，除了此番重大例外，巴尔干和中东欧 1918 年后的局面的创建者们都主要致力于划分新的国界以适应现实的种族人口分布，而不是按照既成的或先前定下的国界去“调整”或重新安置人口（如像二战结束时发生的大规模调整，涉及了 2 000 万人的重新安置）。

1918 年 1 月 8 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向国会阐发“十四点计划”时，他傲慢地宣称，“所有人民和民族”都应获得这一“正义”，政治边界应该根据“历史上形成的划分和国家边界线”来划定。这在美国人听起来精彩、正当而且合理。然而，可能因为威尔逊是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看来他没有意识到“历史形成的划分和国家边界线”在欧洲并不存在（依此而论，在亚洲、非洲也是不存在的！）民族和国家是晚近心理建

322 构的产物,而且构建当中没有统一的标准。它们的界定标准因“民族”语言、“民族”宗教、共同的领土、共同的历史或对王朝的效忠而各异。因此,在一个人口密度较大的大陆地区,“民族”领土的范围以及国界的“恰当”划定,往往就注定会成为激烈争议的焦点,对于东中欧和巴尔干地区正分崩离析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注定会如此。对一个民族的“公正”往往就是对另一个民族的“不公平”。然而,威尔逊总统明白,美国国会直觉上坚持孤立主义路线,因此,要说服大多数美国人更多地干预欧洲事务是不可能的,除非赋予美国一种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使命”,即通过为这个麻烦不断的(次)大陆确立一个更公正、更有序和更统一的“新秩序”,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的争端。他感到有必要求助于美国“自由派”和新教徒匡扶正义的道德本能。像 1947 年的杜鲁门主义一样,民族自决教条和“十四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满足美国国内需求而设定的。虔诚、自负、具备清教徒素养和心灵的威尔逊,以其巨大的毅力、坚韧和宗教热情鼓吹他的学说,尽管事实证明,这些教条“很难广泛而灵活地应用于”1917 年后欧洲的复杂政治现实。(Schulz 1972: 24—25, 85)威尔逊设想,整个世界正稳步迈向“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个所谓“威尔逊邪说”源于 19 世纪实证主义和进化论影响下的某种观念,它设想“进步”、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资产阶级统治等具有历史必然性。这些观念强化了威尔逊的下述信念:在 19 世纪西欧多数地区取得胜利和繁荣的“民族”主权国家体系,同样适用于 1917 年后的巴尔干和东中欧,也会产生类似结果。

1919 至 1920 年的和平协议所规定的国界划分原则,较之于东欧历史上此前种种划分体系,事实上更近似种族原则。(Seton-Watson 1945: 269)然而,威尔逊吹嘘的民族自决原则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它们的效力已经为英法两国战争期间所做的过多允诺所抵消。战争期间,为了说服意大利、希腊和罗马尼亚反对(而不是支持)轴心国,英法以义务绑定或发布正式声明的形式做出承诺。类似地,由于向塞尔维亚流亡政府和捷克流亡者(尤其是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的战时保证,同盟国后来拒绝允许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或斯洛伐克代表团出席

旁听 1919 年的巴黎和会。此外,不难理解,胜利的西方列强要确保新建或扩大了亲西方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经济能够充满活力地发展、边界易于防御而且尽可能获得更多领土,冀望他们成为未来对抗欧洲内部敌手或欧洲战败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强大而可靠的“堡垒”,同时也能成为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堡垒”。很大程度上,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它们获得了远远超出严格应用民族自决原则所容许的更多的领土和经济资源,而另一方面,那些本可成为民族国家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等,无论是其民族自治权还是建立独立国家的可能性,都完全遭到了否定(尽管奥地利德国人曾经以此为武器,攻击西方列强严重违背了他们的意愿)。政治、军事和经济私利往往战胜了威尔逊所声称的原则。的确,尤其是对英法及其盟友而言,“1919 年和平协议在东欧地区的基本目标就是,在两大危险国家——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由新建国组成的防疫带(cordon sanitaire)”。(Seton-Watson 1945: 362)

因此,出于多种原因,备受赞誉的民族自决原则未能如其可能地那样连贯一致地贯彻下去。胜利的西方列强积极支持他们的战时仆从国,削弱战败国和“奉行失败主义的(defeatism)”苏俄,后者在 1918 年 3 月 3 日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中与德国及其盟友达成了“独自和解”。他们更强烈地倾向于支持下述类型的新兴国家,即部分程度上依靠西方资助得以建国、进而被期望坚定地奉行亲西方政策、积极反对“苏联威胁”并秉持对先前敌国“复仇”态度的国家。

然而,在很多人看来,很快明晰的是,胜利的西方大国严重失算。民族自决原则没有高举道德的大旗,同等公正地应用于战胜国和战败国,让自己成为胜败双方都可接受的原则。民族自决原则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的明显不公平和不一致,意味着它越发成为西方背信弃义、虚假伪善和口是心非的象征。这不仅代表了前“敌对民族”的主导认识,而且意大利、希腊和其他国家都有同感,他们深感被协议条款欺骗了,或者对条款“失望至极”。这反过来加剧了对协议的愤怒和敌意,助长

了巴尔干地区、东中欧、德意志轴心国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因此,即使是那些受惠于西方列强甚多的国家,他们也没有始终如一地亲近西方、反对苏联和敌视前轴心国。意大利曾经支持过西方列强,这种支持与其说是出于道义,倒不如说是期望(实际上对方曾向其承诺过)战争结束可以获得更多领土收益。但是,后来由于意大利在巴尔干和爱琴海地区一贯的帝国主义野心未能实现,感觉“被欺骗”了。实际上,巴黎和会批准给予意大利的领土,主要是意大利基于民族自决原则有权对其提出领土要求的地区,也就是特伦提诺和伊斯特利亚(Trentino and Istria)。和会还拒绝了意大利关于巴尔干地区的其他领土要求(英法战时曾允诺过的)。因此,20世纪20、30年代期间,“修正主义”国家要求按照有利于他们的原则修改协议时,意大利甚至给予支持。这直接促成了1936年罗马-柏林轴心的出现。再者,许多巴尔干和东中欧地区的“新建国”谋求与轴心国的“和解”,放松了与西方列强的联系,尽管这主要可以归因于,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西方列强未能给予“新建国”以充分的物质、道义和军事方面的援助。最终,随着实力的天平向有利于轴心国方向倾斜,希特勒才有可能援引民族自决原则对西方列强来个大逆转,提出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日耳曼人自治,借此在1938至1939年撕毁和平协议,“摧毁它的拱心石——捷克斯洛伐克”。(Warriner 1950: 64)事实上,德国的一个自由派曾这样评估协议,“‘凡尔赛体系’的失败不是因为条约本身毫无价值,也不是因为它犯下的错误,而是因为没有及时或着眼于长久未来去修订这些条约,没有继续完成巴黎和会上未竟的工作。”(Schulz 1972: 236)这种特殊的失败不仅应归于英法两国的过失和缺乏想象力,而且应归于和平协议的“道义缔造者”(moral author)^①时运不济,因为他未能说服美国国会批准该项协议。按道理,他对于确保协议“生效”负有主要责任,而且要争取足够的资源、道义和军事援助来确保协议的履行。成立国联是威尔逊的创举,但美国拒绝

^① 指美国总统威尔逊。——译者注

加入国联势必剥夺了国联必备的权力、资源和权威。1920 年,美国重新回到它昔日的“孤立主义”政策上。此后,威尔逊身心衰竭,理想破灭,很快辞世。

尽管如此,由于民族自决原则运用中的不公平和不一致而产生的问题,尚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总起来看,通过巴尔干和东中欧的重构,“摆脱外族统治的”人口数量大约是那些新沦为“外族”统治的人数的三倍左右。(Rothschild 1974: 4)然而,大体而言,1918 至 1920 年间民族自决原则严格运用中出现的异常和偏颇,并非刻意为之,也不是出于无端攻击的目的。实际上,它们是为了提供合法的、可靠的经济和安全保障,并遏制潜在的侵略者(尤其是匈牙利、德国和苏俄),尽管它们有时与所声称的民族自决原则并不一致,而且由此最终酿成了下述危险,即他们企图限制对手或者先发制人地打击对方。不幸的是,各种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原则无法与民族自决原则协调一致。遇到这种情况,民族自决原则往往就被牺牲掉。一方面,那些感觉遭遇不公的民族表现出愤怒或挫折感,另一方面,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期待的满足感久候不至,两者部分程度上实现了相互抵消,而且对这些深感遭遇不公的国家而言,在战败和领土被割让前夕,民族自决原则极大地保护它们免受剧烈的政治、社会动荡。就此而言,俄国和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德国都未逃此劫,不过匈牙利的动荡程度要轻得多。(Rothschild 1974: 13)尽管集中关注协议激发的愤怒和不满,属于正常思维,但应当指出的是,德国(怨恨最深的国家)绝非是遭到最苛刻待遇的国家。实际上,与俄国、匈牙利、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土丧失和经济困境相比,德国的苦难算不了什么。(参见第 330—332 页)相反地,一些其他民族却从成功设法克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难中初步感受到一丝喜悦。

到 20 世纪 40 年代,民族自决原则普遍被视为“基本上无效”。许多难题源于同一个根源:将一个“整齐的民族-国家体系强加给一组胡乱拼凑而成的国家”。这注定会产生一些棘手的国家分裂问题,因为无论是划定一条能创造出同质性民族国家的边界,还是将一切民族聚合